

《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的翻译颁行(下)

李勤璞

(浙江农林大学 文化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中图分类号: H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4)02-0067-08

四、《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版本

《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汉文原书十册,译成三文合璧后则为18本。据各藏书机构目录所载,《三文合璧教科书》藏本最多只有10本,即前10本,而第11—18本,未见有收藏记录。可见,1912年底根据汉文原书第九十两册编译完毕的译本,当时只是缮写出来转呈临时大总统阅览并请奖,并没有石印发送各学校。北京各收藏单位皆无后八本写本的收藏著录。^①

现存《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各有异同。笔者得阅大连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藏本,其前三册,大连本汉文与满蒙文俱毛笔手书;大连本后七册及辽宁藏本全本,俱用满蒙文竹笔书写、汉文铅字,石印。两家藏本各册的封面文字,满蒙文俱竹笔书写,汉文俱毛笔书写。荣德自序不尽相同,如辽宁省图书馆藏本“荣德序”末尾称:

蒙文除《汇书》外,向乏善本。是书一遵钦定满汉合璧四书五经为蓝本,不敢稍有异同,唯汉文难以比附之名词,审定殊非易易。时与李君懋春、叶君大匡斟酌研究,间亦窃附己意,以期完善,而免歧异。并有门人春德、存智、文会、赵恒盛、恩绵、德三等随同翻译校阅,永振、裴福辰、保清、陈自新、恩三、王庆云、恒春、崇祿等缮写敬字。三阅寒暑,始克成编。原未敢出而问世,乃谬蒙列宪知遇,深为嘉许,并钺版流传以为开通蒙藩之先导。僭踰之咎,抑又何辞?惟望同志、君子宥及愚蒙,指其谬误,是则(荣)德所祷祝以求者也。^②

注有下划线的文字,未见于大连藏本。“三阅寒暑”之“三”字,大连本作“二”。可见大连本印制居先,辽宁省图书馆藏本略晚。

据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份荣德禀文记载,前四册“除已印出《教科书》四千册、《劝学文》一千二百册,业经随时禀送分发在案。其未经印出教科书一万六千册、劝学文三千八百册现在均已印出,装订妥当,拟请续行颁发”。故笔者推测,大连、辽宁二馆的版本系两次印行而成,即续印时重抄了前三册,形成今日辽宁省图书馆藏本。大连图书馆藏本,除第二三册以外,其余各册封面书名下方均钤有蓝色椭圆

收稿日期:2013-07-13

作者简介:李勤璞(1962-)男,江苏赣榆人,教授,主要从事内陆亚洲和边疆人类学研究。

① 《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将译者荣德误作“崇德”。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7-39页,编号第0185至第0191。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第一册卷首,叶10a-14a。

圆印章“奉天官立蒙文学堂”表明其来源。

第三种藏本来源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蒙文竹笔书写,汉文毛笔书写,著录为“光绪内府写本”。^①据前文所述,此非内府写本,而是锡良总督两次进呈本的合集。因系手写进呈御览,故其字迹、装池诸方面极为讲究,宛若内府造办。北京故宫图书馆著录为十册,海南黑白影印本标明为八册。视其第七八册页数可知,应系各分两册装订,与上述两处藏本册数相同。各册封面虽未有影印,但互联网上可以检索。书名前冠以“新译”二字,异于大连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藏本。

比较大连图书馆第四册与故宫本第四册目录的字迹,笔者发现,满蒙文同系竹笔(即硬笔)书写,硬朗美观,跟大连图书馆前三册满蒙文毛笔书写不同;汉文也写得比大连图书馆藏本一至三册整饬。

三种藏本的目录页书名均为汉字“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版心书名均为汉字“满蒙汉合璧教科书”。正文部分则有所差异,详见下表:

册次	课文数	目录叶数	课文叶数
第一册	六十课	无目录	故 59 大 59 辽 59
第二册	同上	故 大 辽 11	故 81 大 78 辽 99
第三册	同上	故 大 辽 11	故 99 大 99 辽 115
第四册	同上	故 大 辽 11	故 108 大 146 辽 146
第五册	同上	故 大 辽 11	故 157 大 134 辽 134
第六册	同上	故 大 辽 11	故 187 大 163 辽 163
第七册	同上	故 大 辽 11	故 253; 大 辽 上册 1—30 课 1—117 叶,下册 31—60 课 118—253 叶
第八册	同上	故 大 辽 11	故 290; 大 辽 上册 1—30 课 1—134 叶,下册 31—60 课 135—289 叶
备考	故 北京故宫图书馆 大 大连图书馆 辽 辽宁省图书馆		

故宫本第一册开首仅有“满蒙汉三文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共十一叶,末尾署“宣统元年岁次己酉秋七月吉日”,此系汉文原有序文,后接第一册课文。第八册末尾一叶文字如下:

宣统二年,岁次庚戌,秋七月,奉天蒙文学堂名誉监督、花翎、副都统衔、前蒙古协领臣荣德谨译。

大连、辽宁藏本第一册开首“锡良序”“程德全叙”“荣德序”,故宫本皆无。故宫进呈本是专门制作,跟其余二种版本的根本不同在于荣德第八册末尾署“臣”字;而锡良、程德全及荣德之序俱无进呈本应有的敬辞,不需署“臣”字。况且锡良希望做成“钦定本”,故序言的位置只能留给皇帝。三篇序言之后的“国文教科书原叙”,跟故宫本标题不同,且文末未署“宣统元年岁次己酉秋七月吉日”,至于其课文内容则完全相同。另外,大连、辽宁藏本第一册末尾“李懋春跋文”,故宫本亦无。辽宁藏本共装两函,有(伪)“满国立图书馆”函套,其三文书名下方分别以满蒙汉字题写“元部”(第一函)和“亨部”(第二函)。

概括来看,三种藏本性质如下:

北京故宫藏本:进呈御览等待钦定之本

大连图书馆藏本:初次石印本

辽宁省图书馆藏本:二次石印本

另有图书目录称北京尚有其他版本,因笔者未能亲见,不知其著录是否确实。

^① 海南出版社影印本《满蒙汉合璧教科书》版权页宣称此书为“光绪内府写本”。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 2000 年,第七二四、七二五册,《满蒙汉合璧教科书》。

五、《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的修订

随着中华民国建立,国体发生变革,《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随之受到审查和修订。

辽宁省图书馆藏本第一册序言之前,订有一张折叠起来的表格,纵约50厘米,横约120厘米,汉满蒙三文合璧,俱毛笔书写,为大连图书馆藏本、北京故宫藏本所无。此表格的汉文部分如下:

汉满蒙三文合璧小学教科书校勘表(一册至八册)

册别	课数	页数	原文	改正文	
第二册	第十九课	二十八页	龙旗向日飘	虹旗向日飘	
	第三十四课	五十三页	今有铜圆	自前清光绪时始改铸铜圆	
第三册	第六十课	一百十页	以钱二十	以钱三十	
第五册	第十七课	三十六页	某老爷	某先生	
		三十八页	贵上老爷升启	贵上升启	
	第三十八课	八十二页	实前明之旧都也	实明之旧都也	
		八十四页	近日渐加修治	迨渐加修治	
		八十五页	西便门句下	以上皆前清时帝都之規制也	
	第三十九课	八十六页	自道光二十二年	自前清道光二十二年	
第六册	第二课	四页	西北界西比利亚	西北界俄属西比利亚	
			西南界印度等国	西南界英属印度等国	
			南接安南缅甸	南接法属安南缅甸	
			东隔海与日本为邻	东隔海及日本属朝鲜	
				朝鲜一邦则在我国之东北隅	此二句删去
	第四十五课	一百十八页	咸丰十年	前清咸丰十年	
			一通山海关	一通奉天	
		一百二十页	自庚子之后	自前清光绪庚子之后	
		反我侵地	反其侵地		
	第四十六课	一百二十二页	同治元年	前清同治元年	
		一百二十三页	近者芦汉铁路既成	前清时京汉铁路业已告成	
			粤汉铁路继之	将来粤汉铁路继之	
第七册	第四十九课	一百九十五页	以字计下等句	民国新章省内字费约六分省外加倍密码则加倍较之前清省费多也	
	第五十二课	二百零八页	自光绪二十四年	自前清光绪二十四年	
	第六十课	二百四十八页	福建建宁府至月日等句	应删去	
		二百五十三页	物力已给酒力照例二句	应删去	
第八册	第四十六课	二百零二页	广东始仿其制	前清时广东始仿其制	
		二百零三页	我国虽屡议用金	前清时虽屡议用金然终未行也	

册别	课数	页数	原文	改正文
	第五十三课	二百三十五页	传授我邦	传授中土
			我朝嘉庆时	前清嘉庆时
		二百三十六页	自道光之季	自前清道光之季
	第五十四课	二百三十八页	基督教之初入我国也	基督教之初入中土也
			为我国人所嫉视	为中土人所嫉视
		二百三十九页	挟我政府	挟清政府
	第五十五课	二百四十五页	使我国国力	使中国国力
	第六十课	二百八十九页	光绪三十 年 月 日订定	中华民国某年 月 日订定

归纳起来,这些修订多数出自政治目的,即所谓“国体变更”所导致的校勘,少数是编译缺陷或修辞的改正。表格末尾一栏是汉文“说明”,意在表明修订的宗旨,内容如下:

《汉满蒙三文合璧小学教科书》共十册,由第一册陆续印发至第八册,适值改建民国,复按原书,文义间有与现在国体抵触之处,因饬编译员将未经印出之九、十两册,另行修改,其已经印发之八册成书,未便废弃,并饬将其中应行修改之处,逐次增易注明,分别列表,名曰“汉满蒙三文合璧小学教科书校勘表”。送经教育部审定后,续印发交已领前书之各蒙旗及蒙文学堂,俾参照改正,以期与国体适合,而原书亦免废弃焉。

中华民国元年七月 日 奉天都督府蒙边科谨识

奉天都督府蒙边科饬令译者修改成文,再呈送教育部审查通过以后,制作大表付印,发给原先领取此课本的蒙旗和学堂,令其教学时相应修正。辽宁藏本将此表装订于卷首,以备分发使用。此套教科书到民国时代仍有存留,应为备存。

民国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呈请奉天省长,谓官地清丈局函称“敝局西北楼房内向有图书馆寄存《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多部,查此项书籍部数既多,体量自重,已将该楼房地板全行压坏,墙已倾斜。前经敝局查明请款补修,现在敝局丈务甚繁,需用此房办公,况以有用之书而长此废置,亦殊可惜,用特函请贵厅查照运回,另行择地保存,以备将来应用。”查,此项教科书存置日久,恐致腐朽,因拟请奉天省长令发各旗转给所属学校以资应用,因此具文呈请鉴核示遵。

九月六日,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批示:

呈悉。该局所存满蒙汉三文教科书究有若干?其书中词意与现时国体是否适宜?仰即详细查复,再行核办。此令。^①

可见,《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须经审查修正,方能分发使用。

六、《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译者的嘉奖

1. 荣德开复原官

荣德等人因编撰《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有功,受到宣统帝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嘉奖。荣德本人奉皇帝谕旨开复原官。东三省总督锡良奏称:

蒙边风气闭塞,文言未能一致,教化难以强同,最为行政之障碍。欲期开通智识,必先兴设学堂,而兴学尤以译书为亟。惟近来蒙文几成绝学,寻常通译,大率鄙俚浅陋,舛迕难通。且蒙文简单,中文繁

^① 奉天省长为详查待发三文教科书是否合乎国体事札奉天教育厅,1921年8月31日,辽宁省档案馆藏档案 JC10-30284。

杂,意义有难赅括,不得不证以满文。欲更求贯通满汉文字之员,益难其选。臣上年到任,查有已革花翎、副都统衔、蒙古右翼协领荣德,深习满蒙文言,中学亦有根柢,特委令将学部审定小学教科书编译满蒙汉合璧文字,使读者互文见义,展卷了然。该革员覃精殚思,悉心搜讨,计阅一年有余,译成《满蒙汉合璧小学教科书》八册,词句明显,意义恰当,足供学堂教课之用。业经两次进呈御览,并印刷二万部,分发哲里木盟十旗及奉吉江三省蒙边各学,以资传习。将来文字可期统一,新政可望推行,洵于筹办蒙务大有裨益。

伏查,该革员学擅兼长,热心教育,先经筹办蒙文学堂时,以振兴蒙学为己任。兹复译书籍,有功夫文教,实未便没其微劳。查,该革员于光绪三十一年因办理奉天警察善后各局暨省城学堂,经前将军臣赵尔巽以见利忘义,汇案奏参革职,^①核其原参案据,尚无实在劣迹。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该革员荣德开复原官,赏还翎衔,以昭激劝,出自逾格鸿慈。除咨部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十一月初六日,奉到朱批“荣德着开复原协领衔,该部知道。钦此。”^②

奉谕后,督抚锡良即札飭奉天旗务处:

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奉天巡抚事锡(良)为札飭事。案准陆军部咨开:内阁抄出,东三省总督锡奏,已革花翎、副都统衔、蒙古右翼协领荣德,深习满蒙文言,委令将学部审定小学教科书编译满蒙汉合璧文字。该革员覃精殚思,悉心搜讨,未便没其微劳,恳请开复原官等因。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奉朱批:荣德着开复原协领衔,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到部。除已革协领荣德开复原协领衔之处遵旨注册外,相应恭录咨行东三省总督,钦遵查照可也等因。准此,除分行外,合行札飭到该处即便知照。此札。右札旗务处准此。宣统二年十一月三十日。^③

2. 随同译书出力员书受奖

荣德为参与《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翻译的各员申请民国临时大总统嘉奖一事,见于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记载。

秘书员荣德为呈请事。窃照荣德于前清宣统元年七月间奉前任总督锡巡抚程委办编译汉满蒙三文合璧教科书,飭令先将学部审定之初等小学各种教科书,择其紧要当用者译成满蒙文字,刊成(刻)成书,分发各蒙旗及各学堂,以为开通蒙智之资,并令将译成之书挑选写成汉满蒙三文合璧敬字,装订成册,俾得进呈等因,当即遵将前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校通用教科书十册,于是年十月暨宣统二年九月间先后译成八册^④,刊印成书,呈经分发各蒙旗暨各学堂,并挑选写生缮成汉满蒙文字装订成册,两次禀送进呈在案。惟九、十两册^⑤文字较前八册加多,前后三年有余,始将全书译成,曾经禀送前任都督赵转呈临时大总统鉴核等情,当蒙批示“禀悉。查此项教科书系在国体未更以前编译,其教育宗旨与现在国体抵触者,飭令妥为修改,再行禀送转呈”等因,于奉批后即遵将有与现在国体抵触者均详加修改,现在已一律修改妥谐,除俟刊印成书、再行呈请送部外,理合将九十两册教科书分为八卷,装订二函,呈送都督转呈临时大总统鉴施施行,实为公便。抑荣德更有请者。查此书自前清宣统元年七月奉委编译起,迄今三年有余,寒暑无间,始将全书告成,所有随同校讎缮写各员书均著有微劳,可否准其另单呈请奖励之处,出自钧裁,为此备由具呈,伏乞批示祇遵。谨呈奉天都督张。

计呈送汉满蒙三文合璧教科书九十两册,请奖随同译书出力员书衔名单一纸。

^① 此事见于《清德宗实录》记载。《清德宗实录》,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卷五百五十,叶4,总5054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初四日条。

^② 东三省总督关于已革协领荣德请开复原官翎衔奏片,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二十九日,参见《锡良遗稿奏稿》卷七,第1253页。

^③ 东三省总督为已革协领荣德奉旨开复原官事札奉天旗务处,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辽宁省档案馆藏档案JC10-14184。

^④ 指汉文原书八册。译本则为十本。

^⑤ 指汉文原书第九、十册。

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壬子十一月初九日 秘书员荣德

谨将译书随同出力之员书请奖衔名开呈钧鉴。计开：

同知直隶州用江西候補知县春德、蒙文毕业学员恩绵（此员现充本府文牍员）、州同职衔文会，以上三员均拟请以县知事用。

县丞职衔赵恒盛，翻译生员裴福辰，蒙文毕业学员存智、永振、德三，以上五员均请赏予八等嘉禾章。^①

针对荣德呈文，奉天省长公署呈请临时大总统给予嘉奖。

为呈请事。本年十二月十七日，据本府蒙边股秘书员荣德呈称：窃照荣德于前清宣统元年七月间奉前任总督锡巡抚程委办编译汉满蒙三文合璧教科书，飭令先将学部审定之初等小学各种教科书择其紧要当用者译成满蒙文字，刊刻成书，分发各蒙旗及各学堂，以为开通蒙智之资。并令将译成之书挑选写生，缮成汉满蒙三文合璧敬字，装订成册，俾得进呈等因。当即遵将前学部审定初等小学（通）用教科书十册，于是年十月暨宣统二年九月间，先后译成八册，刊印成书，呈经分发各蒙旗暨各学堂。并挑选写生缮成汉满蒙文字，装订成册，两次稟送进呈在案。惟九、十两册文字较前八册加多，前后三年有余，始将全书译成。除俟刊印成书再行呈请送部外，理合将挑选写生缮成汉满蒙文字九十两册教科书分为八卷，装订二函，呈请转呈临时大总统鉴复施行，实为公便等情。据此，查蒙边风气未开，文言未能一致，教化难以强同，最为民国初行政上之障碍。欲期开通，必先兴学，而兴学尤以译书为亟。惟近来深通蒙文研究有素者，绝少其人，其寻常通译大率鄙俚浅陋，舛迕难通。且蒙文简单，中文繁杂，意义有难赅括，不得不证以满文，欲更求贯通满蒙文字之员，益难其选。该员荣德深通满蒙文字，中学亦有根柢，覃精殚思，悉心搜讨，编译此项汉满蒙合璧文字教科书，使读者互文见义，开卷了然。前已译成八册，词句明显，意义洽当，足供各学堂教科之用，业经两次进呈，并印刷二万部，分发哲里木盟十旗及奉吉江三省蒙边各学堂在案。兹该员又将九十两册译成，分为八卷，一俟刷印成书，仍即分发蒙边各学堂，以资传习，将来文字可期统一，新政可望推行，洵于筹蒙大有裨益。且于民国初建，所有奉到命令、宣布共和一切文告，均经该员一手编译，其中详细委婉，足使蒙人一见了然，而倾心内向。是该员不惟编译教科书有功文教，且于宣布共和亦大有赞助，即此次锡（良）奉命宣抚到长（春府），所有文言浅说通告以及演说之词，亦皆系该员一人编译，深资擘画，实属异常出力，非寻常劳绩可比。该员荣德原官副都统衔、花翎、协领，现充本府秘书，拟请改以观察使任用，并请赏给三等嘉禾章，以示优异而昭激劝。除令该员荣德将此书躬亲进呈鉴复，其次出力随同校对缮缮员书，另单附呈，并请一并给奖。俾是否有当，伏乞批示祇遵。谨呈临时大总统。

秘书员荣德呈送九十两册教科书，请转呈大总统由。

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 日即壬子十一月 日

给奖的请求获临时大总统批准，铨叙局为此行文奉天都督：

为咨行事。前奉大总统发下贵都督呈请奖给秘书荣德等勋章一案，业由本局核议呈。奉大总统令：荣德给予三等嘉禾章。此令。又奉令：春德、恩绵、文会、赵恒盛、裴福辰、存智、永振、德三，均给予九等嘉禾章。此令。各等因。查，《颁给勋章条例》第四条内开：颁给勋章经大总统特令或批准后，由铨叙局注册并填明执照，附同勋章一并颁给等语。兹奉前因，相应检具三等嘉禾章一座、九等嘉禾章八座，勋章执照九张、勋章令九册，并抄录原呈咨请贵都督查照，分别转给领受，并取具各该员履历咨复本局，以凭注册可也。此咨奉天都督。

计咨送荣德三等嘉禾章一座，勋章执照一张，勋章令一册。春德等八员九等嘉禾章八座，勋章执照

^① 秘书员荣德为请转呈大总统九十两册教科书事呈奉天都督，1912年10月，辽宁省档案馆藏档案 JC10-23214。

八张,勋章令八册。^①

虽经国体变革,编译《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的荣德等人终获较高嘉奖。

七、《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翻译颁行的意义

清朝在内地 18 省与蒙古、回部、西藏等藩部实行地域之间的“隔离”制度,内地与藩部不相交流,但与朝廷皆建有垂直分立的权力关系,以维持皇帝的统治局面。^②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应对海陆侵略时屡遭挫败,方意识到此时的夷狄非复先秦以降的塞外游牧部落,乃渐思改弦更张,实施新政,以图自存。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不乏“内蒙古部落禁令”。^③

(道光)十六年奉旨:嗣后蒙古人,止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名,不须取用汉人字义。(叶 4b-5a)

(道光十九年)又定: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或充书吏。违者照不应重私罪议处,书吏递籍收管。(叶 5a)

咸丰三年谕:蒙古人起用汉名,又学习汉字文艺,殊失旧制,词讼亦用汉字,更属非是。着理藩院通谕各部落,嗣后当习蒙文,不可任令学习汉字。(叶 5b)

光绪二年奏定:蒙古公文呈词等件,不得擅用汉文。违者照例科罪。其代书之人,递籍管束。若事涉词讼,代写汉呈者,无论有无串通教唆情事,均按讼棍律治罪。(叶 5b-6a)

这几条稍加修订,纂入《理藩院则例》,成为正式的法条。^④上引“禁令”里还有几条禁止蒙古汉化的:

(嘉庆)二十年谕: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听演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习邪教,尤属非是。着理藩院通飭内外札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为管束,俾各遵旧俗,仍留心严查,倘有游民习学邪教,即拏获报院治罪。(叶 3b-4a)

(嘉庆二十三年)又奉旨:近日蒙古王公蒙养优伶,大改敦朴旧习,殊为忘本逐末。嗣后各蒙古部落挑取幼丁演戏之事,着永远禁止。(叶 4a-b)

在蒙古地方,这些禁令的执行比较复杂,有时仅是一纸空文。例如,曾因参与翻译三文教科书得到嘉奖的蒙古毕业学员、荣德的学生存智,虽为科尔沁左翼前旗西扎哈气村蒙古,但其名却取自汉文字义。^⑤在清末新政时期,上述禁令逐渐废弃。在昭乌达、卓索图和哲里木三盟沿边地区(即今赤峰、朝阳、阜新、通辽一带),蒙古各部同化较早,尹湛纳希家族(北票)、喀喇沁王府即为显著之例。

与清末新政紧密相关的东三省蒙务局的创建,缘于姚锡光筹办蒙务一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姚锡光为答复学部又作“蒙古教育条议”,内称:

窃谓今日定蒙古教育,莫良于蒙汉同化之一法,此于国家有利无害,于蒙古有利无害,于汉民亦有利

^① 铨叙局为奉大总统令嘉奖编译三文教科书出力之秘书员荣德等九员事咨奉天都督,1913年2月27日,辽宁省档案馆档案 JC10-23214。

^② 参见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③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六三至九九七“理藩院”,影印本收入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大清会典理藩院事例 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 卫藏通志》,1991年。本文即用此本。

^④ 杨选第、金峰校注:《光绪本理藩院则例》,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卷五十三 违禁,第365页。

^⑤ 伪满时期,存智隐去汉名,更名为克兴额,取自满语 kesingge“有福分的”一词。参见李勤璞《彰武县圣经寺考》,《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一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存智履历另见中西利八《满洲绅士录》(东京:满蒙资料协会,1940年,第1222页)“存智条”:“克兴额,勋六位,民生部教育司编审官。[出生]光绪一五 兴安省科尔沁左翼前旗。[学历]民国元 奉天第四中学卒。[经历]建(伪满洲)国前奉天省公署科员,后经兴安南省秘书官、总务厅总务科长就任现职,荐任二等。[住所]新京民生部。”

无害,似蒙汉同化之教育定,而教育之宗旨即定。蒙汉同化,则互相携手,同为国民,以御外侮。^①

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丁亥日,理藩部奏:

藩部豫备宪政,首在振兴蒙务。开浚利源,莫重于辟地利;启牖蒙智,莫急于化畛域、通文字诸大端。谨先酌将旧例量为变通,以为筹办蒙务措手之方……。曰变通禁止民人聘取蒙古妇女之条。旗汉现已通婚,蒙汉自可仿照办理。拟由各边将军都统大臣各省督抚出示晓谕,凡蒙汉通婚者,均由该管官酌给花红,以示旌奖。曰变通禁止蒙古行用汉文各条。旧例内外蒙古,不准延用内地书吏教读。公文禀牒呈词等件,不得擅用汉文。蒙古人等不得用汉字命名。今则惟恐其智之不开,俗之不变,断无再禁其学习行用汉文汉字之理。应请将以上诸例一并删除,以利推行而免窒碍。从之。^②

在禁令解除以前,荣德即以部定教科书编译成满蒙文字,作为蒙文学堂的教本。东三省总督和奉天巡抚复将之付印,发给蒙旗学堂使用,同时又作为“筹蒙”具体业绩进呈御览,皆系新政之举措。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事关内地学堂;朝廷并未同时就外藩兴学奏定章程。不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谕令蒙旗兴学,“由学部发给《学堂章程》”^③,意味着《章程》适用外藩。这部内地编辑、学部审定,推荐给全国内地小学堂使用的汉文教科书,虽一经出版即被广泛采用,但并未同期用于“蒙疆”小学堂。因此,荣德的编译和教学实属创举,这使得清朝在外藩与内地之间设定的文化——社会“隔离”被打破,开启了一个新的国体的形成。外藩地区语言、政教、风习内地化,以及内地与外藩的一体化,导致一个“新清朝”的出现。

这看似具有非凡政治意义的大事,本应受到国民欢迎。但当时,一个同样重大的政治文化进程发生在漠北地区,库伦地区的俄罗斯化进程持续强劲地蔓延,外蒙古成为俄罗斯人的征服空间。在清朝新政时期,熟悉蒙古历史和现状的有为之士看到蒙古人中的离心倾向,故在倡导语文教化一体化的同时,还提出移民实边和开辟交通这两项决定性的措施以维护中国对蒙古地方的主权。移民是指移内地之民至蒙古地区,交通是指蒙古地区与中国中心地区的连接。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两项措施更为有效。

后人应该给予清朝最后10年的新政一个正面的评价。不论其动机若何,实施新政的目标在于把古老因循的大清帝国蜕变成当时西洋化的国民国家,因此,既定的外藩地区与内地隔离与分行教化的体制(所谓“齐其政不易其宜”古训)必须取消,以便于完成国境以内的政治、教化乃至交通联系的一致化和一体化。盛京将军与东三省总督历来有管辖哲里木盟十旗的职掌,故必须思考如何筹蒙即振兴蒙旗,以便强化边疆,应对日俄的拉拢、渗透和分化。其中首要而易办的事情即是创办西式学堂,教授汉语文,以便输入一切有用的知识和新的国家观念,于是教科书的编撰颁行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时的观点认为,蒙古文简单,汉文复杂;前者需保留,后者需修习。而蒙古人学习汉语文的桥梁即系满语文。适逢荣德在教学中编译部定初等国文教科书为三文合璧课本,正合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的期望,遂石印分发蒙旗和学堂,同时进呈御览,当属筹蒙新政的业绩之一。迨民国建立,三文教科书译本又从新国体的角度稍加修订,继续使用。所以说,这部教科书在翻译颁行的短短两年内,经历中国国体巨大变更,具有政教上的标志作用。

至于这部教科书在各个蒙旗小学堂的使用,对民国和伪满东北蒙旗语文教化的影响,荣德等奉天旗人译者的生平事迹等,若能全部呈现出来,“新清朝”在东北外藩地区此次语文教化的全貌则不难厘清。

(续完)

^① 姚锡光《筹蒙条议》,参见内蒙古图书馆编《筹蒙条议 东蒙古纪程 东四盟蒙古实记 经营蒙古条议 昭乌达盟纪略 蒙事一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② 这份理藩部奏折,著录题名为“某部为变通在蒙部开荒、蒙汉通婚、蒙人使用汉字等禁例给宣统帝的奏折(1911年2月24日)”,收入许新江主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8-309页。

^③ 参见《调查科尔沁左翼后旗报告书》“户口附学堂”,内蒙古图书馆编《哲里木盟十旗调查报告书》(影印本),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